



日本中國美術文庫

王晓平◎主编

中国的美术及其他

〔日〕冈仓天心◎著

蔡春华◎译



中華書局

日本中國學文庫

王晓平◎主编

中国的美术及其他

〔日〕冈仓天心◎著

蔡春华◎译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的美术及其他/(日)冈仓天心著;蔡春华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9.6
(日本中国学文萃)
ISBN 978-7-101-06464-3

I. 中… II. ①冈…②蔡… III. 美术史-研究-中国 IV. J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9242 号

书 名	中国的美术及其他
著 者	[日]冈仓天心
译 者	蔡春华
丛 书 名	日本中国学文萃
责任编辑	马 燕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½ 插页 2 字数 200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6464-3
定 价	22.00 元



总序

王晓平

日本人(包括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迁徙到列岛的人们及其后裔),至少从我国南北朝时期便揭开了研读中国典籍的历史,而伴随中国文化进入日本所产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诸如写经抄书、创造假名、宫中讲经、发明训读、朗咏流行、设明经文章诸科博士、藏典修史等等,构成了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壮观的奇景。日本人审视中国的同时,也在成就着自身。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从广义上讲,日本人研究中国,几乎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岁月,但学界真正把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中国学”,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

长达一千五百年以上的中国研究史,是与日本文化的开创和发展紧密联系的。尤其在近代以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完全抛开中国学术史,便没有完整的日本学术史可言。但是,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研究中国的目的、方法和态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尽管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文献学的影响依然存在,但与西方学术同时也与本土固有文化研究建立的联系,远比与中国学术的联系敏感、紧密而又牢固。不论如何,从古至今,日本学界产生了众多研究中国的大学问家和名文名著。

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与中国自身的学术研究最大的不同,就是主导这门学问的根本课题,是岛国日本如何面对大陆中国。它



们不仅植根于异质的文化土壤,从属于日本文化体系,反映或者作用于当时日本的包括民族主义思潮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在日本学界获取评价,而且根本目标在于发展日本文化。所以尽管它们有时与中国本土学问面临着同一对象,然而两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和价值。

在世界文化走出各自分割历史阶段的今天,国外的中国学与中国的国学共同构成世界的学术中国观,而又各属不同的学术体系,发挥着不同的文化功能。对于中国的国学来说,国外的中国学可以说是不宜回避的“他者”,日本的中国学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进一步说,日本中国学除了具有其他国家中国学的共性之外,还有一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离不开一个“近”字。例如由于许多业已散佚的中国文献通过抄本或者刻本保存在日本,使得日本成为域外最重要的中国文献资料库之一;又如日本拥有传统的阅读和训释中国文学的特殊手段等等,这给中国文献的传播和解读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同时,由于中日两国学术交流源远流长,日本中国学与日本学研究的关系特别紧密,也使得它在考据和比较研究这两方面,有着更多的资源和课题。

在日本,对日本古代学术文化的研究,常常不能与对中国的研究一刀两断,再加上现代学术谋求沟通的大趋势,便使得日本中国学者,例如内藤湖南、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人著述的影响超出了中国学的范围;另一方面,某些研究日本学的著述,例如明治时代的民俗学家、最早的环境保护运动力行者南方熊楠,有“知识巨人”、“时代代言人”之称的加藤周一,“文化功劳者”称号获得者中



西进等人著述中涉及中国学的部分,也都有一读的价值。

日本近代以来在某些研究条件或手段上不同于中国本土,日本学人多重实闻亲见,不尚空谈,长于细读深究。他们在某些领域,例如中国宗教文化、敦煌文学、中外关系史、艺术史以及中国戏曲小说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曾给中国学人以启迪。日本从奈良、平安时代起逐渐形成一些接受中国文学的热点,如《文选》、《白氏文集》、《唐诗选》、《古文真宝》等,对这些作品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成果,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有着互补互鉴的作用。这些都使得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报以热眼。学人多以“他山之石”、“邻壁之光”来强调这种关注的借鉴意义。

与此同时,中国学术界又从很早便有对盲目追随日本学人态度的批评。早年章太炎先生对这种态度给予的辛辣讽刺,虽不免言之有偏,却仍不失警戒之功。前辈学者对于当年那些所谓“支那通”的揭露,更不该忘记。在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展开系统研究的时候,仍有必要反对任何形式的食而不化与人云亦云现象,强调中国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统一,葆有学术自信和识别眼力。

今天,更要看透那些变样翻炒“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的所谓“中国通”,他们往往将历史和现实作短线连接,凭借现代媒体和出版业,朝论夕改,张大偏见,仅就学术手法而言,也实不足为训。应该说,这些人虽然不是日本中国学界的主流,但是他们头上也顶着“大牌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和“社会名流”的帽子,近年来忙不迭煽乎所谓“厌中”(讨厌中国)情感,就很有些拉着舆论走的能量。



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我们对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价值,绝不止于“借鉴”,也不应该停留在“此优彼劣”的结论上。对日本来说,日本中国学是日本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从整体上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某一时期日本人的中国观、中国形象、中日关系。日本的知识界,往往通过它们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专家们,以及有些并非专门研究中国的思想者写的关于中国的著述,对短期或者较长期的社会思潮,有时甚至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都起过某种作用。言说中国的学术话语与官方话语、媒体话语及民间话语等共同营造着中国形象,而其中学术话语的影响则更为长久深远。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学人来说,通过这些著作来了解日本文化、认识日本人、解读日本人的中国观,或许也不失为一条途径。同时,我们对日本社会文化看得越透彻,就可能对日本中国学研究得更为深入。

总之,在中日文化双方不能不互相正视的今天,对待格外重视师承流派、积淀深厚、做派繁复、多变多样的日本中国学来说,草草一瞥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原始察终,辨源析流,叩同问异,进而学会平等地与其展开卓有成效的学术对话。既是对话,那当然不是只“知己”就行了,还必须“知彼”;不是一般的“知”,而是要深知熟稔。所幸我们已经有了《日本中国学史》、《日本汉学史》等专门的著述,让我们看到了日本中国学乃至国际中国学研究的广阔前景。

国际文化交流发展到今天,在人们对吸收外来文化倾注着空前热情的时代,面对别种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显出更大的必要



性。这种声音,不是自说自话,而要有往有复。因而,加强对国际中国学的研究,必然会与我们的“中国学”走向世界相联系。在这一方面,日本学界可谓先行一步。为了推进国外的日本学研究,十多年以前,日本便建立了对外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最近又在法政大学设立了国外日本学研究基地,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对国际日本学研究展开分析。以此反观我国知识界的一般认识,有些人多只看到那些操着怪腔怪调汉语的外国人在该国学界没成什么大气候,又爱发些对中国隔靴搔痒的议论,就轻看国际中国学研究的意义。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工作的紧迫性。

读书或可睹人。推进学术交流,化解误解误读,减少文化摩擦,出书、读书、品书与人员交流对话,是有力的两翼。我们阅读日本中国学著述的时候,如果不只停留在听他们述说什么,而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会那样说,和同时期中国本土研究有哪些不同,那么,这些材料就可能演化为我们拓展本土文化研究和外国文化研究两大领域更有用的思想资源。对于收藏在日本的中国文献,日本学者已经对文本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我国学者却常因为无法与原件谋面而深感遗憾。有些日本学者抱怨中国学者对日本存藏的中国文献抄本、刻本评价过低,而实际原因是这些资料一般中国学者很难看到。面对涉及各类学科的日本中国学著述,切实了解它们的最好方法无疑是阅读原著,而且是系统阅读,因为翻译有时难免会模糊两种文化的细微差异。然而,在很多有兴趣的学人还没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的时候,翻译就显示着特殊的必要性。

我们选择一些篇幅不长、适于阅读的名篇名著、新人新作介绍给读者,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日本中国学的多种面孔。我们



在坚持学术规范的同时,也不应排斥学术研究的个性化与多样化,这些研究和写作方法的异色,或许能帮助我们扩大眼界。

我们这套丛书,没有选择像斯波六郎所著《文选李善注所引古文尚书考证》,或者太田次男所著《以旧抄本为中心的白氏文集本文的研究》那样大部头的专著,它们学术价值很高而读者面很窄。这些书很重要,等条件具备,也应该译介过来。我们先要做的,是希望读者能认识一批比较好接近的客人,也就是一批学者为非中国学专业知识分子写的书。

日本一些研究中国学的名家,很重视为一般读者写书。吉川幸次郎曾提出让学问回归大众的口号,白川静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也强调在孤诣独往苦苦求索的同时,要努力使学问返回到“一般”,即回报于社会。像青木正儿等人文笔之好,在学界早有定评,他们关于中国文化的学术随笔脍炙人口,几十年来一直是书店的畅销书。

我们选择的书目,除了几部新人新作外,都是“大家”写的“小书”。或侧重于保留中国文献资料的价值,或侧重于对中国本土研究的补阙,或侧重于对中日关系研究的历史作用,或侧重于在日本学界的影响。取其一点,不必求全,积少成多,不拘一格,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通过这套丛书,读者便可陆续与那些久闻其名而未见其文的好友见面,共享日本中国学之景观。



前言 一个东方文化的“辩护者”

冈仓天心(1862—1913)是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思想家、美术家、美术批评与教育家。他有着极高的东西方文化素养,人生阅历丰富,学术视野开阔;他历经了明治时期日本知识界、美术界的动荡思想风云;他数度迈出国门,游历欧洲、中国与印度;他历任波士顿美术馆的顾问、东方部部长,不遗余力地向西方世界推介东方美术;他以英文著书,面向西方世界历数东方精神、文化与艺术的魅力与价值,他的旁征博引,诗人般的激情与诗意笔调,曾经征服了西方世界的无数读者;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他的创作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征战口号。这是一位足以代表那个东西方文化猛烈撞击时代的文化人物,这是一位足以代表明治时期日本知识阶层的知识分子,这也是一位中国人不可忽视、不能不研究的日本学人。

(一)冈仓天心其人

冈仓天心的乳名为觉藏,十五岁时改名觉三,三十五岁时改号天心。他出生后的第七年,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明治时代,他的青年时光就是在这种维新的氛围中度过的。冈仓



天心的父亲勘右卫门原为武士阶层中的下级藩士，因为人正直、善于经营而受命到横滨从事丝绸贸易。当时的横滨是“黑船事件”^①发生后日本最早开港的港口城市。来自英国、法国、美国、荷兰等国家的形形色色的西洋人蜂拥而入，横滨不仅成了外国人的聚居地，也成了一个开时代风潮之先的城市。勘右卫门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时代的变化，在冈仓天心八岁时就送他到一个来日的美国人那里学习英语。冈仓天心的英语水平、英语著作屡受赞誉，与这种始自幼年的教育不无关系。一年以后，冈仓天心拜神奈川长延寺的住持玄导和尚为师，开始学习汉文。

冈仓天心十四岁时到东京的开成学校（后改称东京大学）学习，专业为英语，十九岁时从东京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毕业论文写的是美术论。大学期间的冈仓天心很活跃，他向女画家奥原晴湖学南画^②，向儒学者加藤樱老学弹琴，向汉学老师中村正直学《诗经》，还参加了汉诗社“茉莉吟舍”。他的一生留下了许多精彩的汉诗，这些汉诗不仅展现了冈仓天心卓越的文采，更是他的人生旅程与人生感受的缩影。这也是明治时期许多日本知识分子的一种写照，时代的大潮的确在轰轰烈烈地奔向“脱亚入欧”的港湾，但汉诗已然浸透了他们的血液，即便能熟练运用英语，可人生的许多复杂感受仍然要依托汉诗来传达，夏目漱石如是，冈仓天心亦如是。在大学期间，十八岁的冈仓天心结了婚，并开始学习茶道。

① 1853年，美国海军军官佩里率领舰队抵达江户海湾，日本被迫开放国门，结束了闭关锁国的时代。

② 日本始于江户时代中期，受中国明清绘画影响但又有所创新的画派所作的画统称为南画，也称文人画，代表画家有池大雅、与谢芜村等。



大学毕业后，冈仓天心进入日本的文部省工作，从事过调查日本音乐教育情况、美术教育（尤其是传统美术教育）情况的工作，以及影响了他一生的对日本古社寺的调查。在这次历时五年（1884—1888）的古社寺调查中，冈仓天心不仅参与调查，还担任同行的美国学者厄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 Fenollosa，1853—1908）的翻译。费诺罗萨



是冈仓天心大学时的老师，擅长黑格尔派的哲学与德国浪漫主义美学，到东京大学任教后，又逐渐对东方哲学、佛教、日本美术产生了兴趣。冈仓天心从大学时代起就担任他的翻译，深受他的影响，他们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缘。之后，他们数度合作进行美术调查，并最终影响了当时日本画坛的发展，所以学界称他们在东京大学的相遇为“东方美术与现代鉴赏力的相遇”^①。

冈仓天心在这次调查中，打开了日本古老的法隆寺的梦殿，将其中秘藏的救世观音菩萨像公之于众，这是日本美术史上的一段佳话。相传梦殿是不能开启的，否则将遭雷劈。冈仓天心出示了日本政府的调查令，强行让僧人们打开梦殿，这尊在黑暗中已蒙尘一百五十多年的珍贵佛像，终于向世人展露出了她的面貌。这在冈仓天心的一生中，可以说是一个具有高度象征意味的事件。在

① 《天心小传》：张唤民译《说茶》，第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



本次调查过程中,日本古典美术以其惊世骇俗的美深深地震撼了冈仓天心,让他在欧美画风席卷日本画坛之时,仍坚定地捍卫与肯定日本传统绘画的价值,并成为推动他将一生奉献给美术事业的原动力。

1889年,冈仓天心出任帝国博物馆美术部部长,与美术同仁创办美术月刊《国华》,冈仓天心在《国华》上发表了不少文章。1890年,他出任东京美术学校的校长,这是日本第一所正规的美术学校,冈仓天心时年二十九岁。他不仅参与学校的行政事务管理,还兼任美术教师,讲授美术史。冈仓天心一生共留下三部美术史——《日本美术史》、《泰西美术史》与《泰东美术史》^①,这些都是他不同时期的课堂讲义。冈仓天心亲自为学校制定的发展规划中,继承保护传统绘画与适应时代的发展、开拓传统的日本美术的指导思想并行不悖。他组织学校的学生学习时,还常利用职务之便,让学生到博物馆进行现场临摹,这种教学方式很受学生的欢迎。

1898年,冈仓天心被免去东京美术学校校长一职,帝国博物馆美术部部长一职也被免去,冈仓天心的事业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有关个中原因,说法不一。有的说是他放荡不拘的性格造成的,有的说是因他与上司九鬼隆一



^① 泰西为西洋的美称,泰东为东洋的美称。



的妻子初子的恋情引发的,还有的认为是因为他受到了欧美画派的排挤等等。不过,该校以桥本雅邦为首的十七名教师因此联名辞职,以实际行动支持冈仓天心,这足见其影响力。也就在这一年,冈仓天心与这些跟随他的教师们一起创设了日本美术院,并创办美术院的杂志《日本美术》。

从四十岁起,冈仓天心的事业与生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的生活舞台不再局限于日本本土,他的美术事业踏上了一个新台阶。1901年,他受日本政府的委派前往印度考察,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遍访印度历史古迹,并与印度思想家威埃卡南达、作家泰戈尔等交往。从1904年起,他受聘于波士顿美术馆,常年往返于美国与日本之间。应该说,波士顿美术馆的美术事业开拓了他的艺术视野,既使他有了更多便利条件去细细品味西方艺术,也使他更为珍视东方艺术的价值。在这一意义上,冈仓天心可谓是真正具有世界性评判眼光的伟大艺术家。

1913年,冈仓天心平静地走完了他的一生。在追悼会上,他的朋友们身着古典礼服,高颂“南无大悲观音菩萨”为他送行,他死后的法号为“释天心”^①。

(二)面向西方世界的言说

冈仓天心生前曾出版过三册英文著作,即《东洋的理想》(*The Ideals of the East*)、《日本的觉醒》(*The Awakening of Japan*)和《茶之

^① 冈仓天心从大学时代起就倾心佛教艺术与思想,二十四岁时受戒,法号“净信”。



书》(*The Book of Tea*),学界将其称为“三部曲”。它们是冈仓天心面向西方世界的读者而写的,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西方世界从19世纪开始的对亚非拉国家的殖民侵略,不仅从这些落后国家强取豪夺了大量的财富,还引发了国家、种族之间的种种冲突与流血牺牲,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这种殖民侵略带给人类的恶果。永不满足的贪婪欲望,坚船利炮的无情轰炸,谈判桌上的丑恶交易,亚非拉土地上的弱小国家们就在这种大规模的侵略铁蹄下呻吟着,国家主权沦落了,精神世界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这是一个东西方猛烈撞击的时代,这是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在贯彻“弱肉强食”理论的时代。

作为一个有着良好东西方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冈仓天心以他独特的方式对这一时代做出了回应。印度之旅使他亲眼目睹了殖民地人民的悲惨生活景况,欧洲之旅与美国的生活让他在领略西方璀璨的文化与美术的同时,也让他看到了西方精神世界的喧嚣与阴影。于是,在日本社会义无反顾地奔向欧洲列强队伍时,他选择了回归日本,极力捍卫日本的传统文化与美术。

当时的日本美术界就是日本社会的一个缩影,力主极端欧化的欧美画派占据了上风,传统日本绘画黯然失色,陷入了艺术生命的低潮期。在冈仓天心与费诺罗萨等人的推动下,明治时代中期,日本国内涌起国粹主义思潮。美术界是这次思潮运动的急先锋,“龙池会”应运而生,力主复兴日本传统美术,并创办了会刊《工艺丛谈》。在欧美画派与传统画派激烈对垒,并日益走向极端化的冲突中,冈仓天心的身影是独特的。他醉心于传统日本文化与美术,深谙它们的价值,但他也受到了欧美文化的冲击。早在1886年,他就随同费诺罗萨到欧美进行历时约九个月的美术调查,这是冈



仓天心第一次到欧洲。考察打开了他的视野,他曾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说道:“欧洲的美术一步步地征服了我——这种征服不在于它的外在形态,而是精神上的征服。我比之前的任何一个时候都更接近这些艺术家们。虽然东洋的美术家们大多以线条作画,而西洋的美术家们则大多以象征的手法作画,但他们倾诉的是相同的爱与同样深沉的情感。他们代表了美术的一个侧面,我们的美术家也是。正因为这两者是不一样的,所以它们的结合才能共同描绘出一个真正的美的理想。”^①冈仓天心找到了这两种艺术的交汇点,这使他摆脱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掣肘,在捍卫日本的传统绘画时,也能理性地、以行家的水准合理地吸收西洋绘画的可取之处,从而推动了具有捍卫与革新双重意义的“新日本画运动”。这一运动开辟了一种立足自主创作、结合传统绘画与外来西洋画进行创作的新局面,在日本文化、美术的现代化进程中功不可没。

在这样的背景下,迈出国门的冈仓天心投身到了另一种文化事业中,即面对西方世界的读者,凭借他深厚的东方思想、文化与艺术的修养,以开阔的世界视野去探索世界格局中的东西方文化冲突这一富含历史与思想意蕴的课题。

《东洋的理想》在冈仓天心去印度之前已基本完稿,1903年刊行于伦敦。书的出版得到了英国女性妮维代特(Margaret E. Noble, 1867—1911)的帮助,妮维代特校阅了该书并写了序言,高度评价了它的文化艺术与思想的价值。该书的主要创作意图应是向西方世界阐释日本的美术及其思想的历史,其中有九节逐一介绍了日本从飞鸟时代到明治时代各个时期的美术特色及其文化思想

① 《冈仓天心相册》,中村愿编,第36页,中央公论美术出版社平成十二年。



内涵。但是,冈仓天心在阐释这一课题时,是以整个亚洲文化为大背景的。他首先追溯了中国的儒教、道教的思想与文化,印度佛教的三个发展阶段与同时期的艺术特色,并回顾了这两种文化对日本的影响,然后才进入对日本艺术的介绍。《东洋的理想》的第一句即为“Asia is one”,即“亚洲是一体的”。它既是该书的基本论调,也是冈仓天心思想的一个集中体现,而这一句子的横空出世所可能带来的影响与后果,也绝非当时的冈仓天心所能预料得到。姑且不论西方世界如何接受与评价该书,这一著作在东方世界引发的反响则集中在一个焦点上,即该书的基本命题是:东方文化是一体的,当中国和印度这两大文明古国委靡于西方列强的枪口下之后,日本成了集东方文化菁华的代表。简而言之,即亚洲是一个统一体,而日本是这个统一体的代表。这样的论断不能不引发日本之外的读者,尤其是中国读者的深思与反省!

《日本的觉醒》1904年刊行于纽约,该书向西方读者介绍了日本从封建走向近代化的演变过程,强调了日本在文明开化进程中继承传统的必要性。应该说,该书是对《东洋的理想》的进一步的补充与阐释。

《茶之书》1906年刊行于纽约,西方世界对这部书的反应要远远热烈于前两部,很快就出现了瑞典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多种译本,它在为冈仓天心赢得世界性声誉的同时,也以日本文化的精华——茶道征服了西方世界的众多读者。日本的茶道糅合了绘画、插花、陶器、书法、建筑等多种艺术形式,思想上以东方的禅宗为引领,追求的是“茶禅合一”的纯粹境界。20世纪初期的西方世界也许可能蔑视并拒绝东方的所有产品,但他们对茶却情有独钟。冈仓天心以诗意的笔调娓娓追溯茶道的历史以及与茶道相关的种